

泉币春秋

华夏钱币文化赏读

钱币无声，凝聚着古人的艺术思想，审美情趣，思维特点，行为方式等内涵，钱币不仅作为商品交换媒介具有货币职能，而且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金面真实形象地反映文明时代的发展和生活会生活。琳琅的钱币以历史的沿革为序，上启先秦下至民国，兼收并蓄不同时期及各少数民族政权铸币史实，杂彩纷呈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与厚重。

司马法良 编著

华夏经典传统文化赏读

中州古籍出版社



华夏经典
传统文化



赏读

司马法良·编著

泉币春秋

华夏钱币文化赏读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泉币春秋:华夏钱币文化赏读 / 司马法良编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7
(华夏经典传统文化赏读)
ISBN 978-7-5348-5424-8

I . ①泉… II . ①司… III . ①古钱 (考古) —文化—
中国—通俗读物 IV . ① K87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2389 号

图片提供: ©微图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 0371-65788698 0371-65788693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16

印张: 16

字数: 216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人人都与钱打交道，却未必人人都知道“钱”最初是怎么出现的，最早的“钱”是什么样，也不是人人都知道钱币史的起点。本书将对“钱”从头说起，有助于人们了解“钱”，并为那些热衷古钱币收藏者和鉴赏者提供一些专业知识。

中国素有“文物之邦”的称谓，历代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多不胜数，其中就包括古钱币。悠久的钱币文化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钱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商周时期，中国新出现了实物货币——“贝”，其后各种不同形制和质地的仿贝类钱币陆续出现。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中国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属货币铸造时代。到了春秋战国，在不同地域经济状况下，相继出现了布币、刀币、圜钱和方孔圆钱等不同的货币流通区。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货币，于是使方孔圆钱成为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基本货币形态。

对于中国古钱币的研究，最早始于南朝，时人顾烜编撰了《钱谱》，后经继承发展，使之成为一个专门学

科——“钱币学”。多年来，中外许多考古学家、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和文物工作者都曾对古钱币这一内涵丰富的“宝藏”进行过大量研究和考证，并取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硕果。本书的编写以历史的沿革为顺序，上启先秦下至民国，兼顾不同时期及各少数民族政权铸币史实，兼收并蓄，图文并茂，融科学性、观赏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为一体，使读者在观赏一枚枚钱币图片的同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领悟古钱币的奥秘。

目录

钱史篇

钱史	2
钱币溯源	2
钱币的发展	11

造钱篇

造钱	178
铸钱工艺的发展	178

钱荒篇

钱荒	214
纸币的产生	214
钱多与钱少	223

钱文篇

钱文	236
钱币理论	236



钱
史
篇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荻篲，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钱 史

“钱”最初是怎样的？我们的祖先用的“钱”是什么样的？为了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从头说起。

钱 币 溯 源

最早的钱币是什么样子的？钱币史的起点在哪里？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文字资料和文物资料都太少了，以致人们只能看到它的模糊影像。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了解：钱币——或称货币——是交换和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所以，要追寻中国钱币史的起点，要弄清中国最早的“钱币”是什么模样，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我国早期交换和贸易的发展情况。

“贝”与“朋”解析

“市”是古代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易·系辞》上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说：“祝融作市。”《尸子》上说：尧时“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粝米菜粥”。这些记载都讲我国早在夏商周

三代以前就有“市”了。又有记载讲舜曾亲自经商，死后葬于“南已之市”。这些记载究竟可信不可信很难判定。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当时人使用文字，有人认为当时遗存的陶器上的符号便是文字，但尚有待论证。更没有发现当时人留下的文献，上面引的这些记载都是很久以后春秋战国时人甚至汉代人追述的。不过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记载，因为证据不足。相反，考古资料表明，至少在尧舜禹时代存在初步的交换和贸易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把人们探寻的目光引向朦胧的上古。

有了交换和贸易，不等于就有了货币，只有交换和贸易发展到一定水准才会产生货币。“市”的存在仅仅为货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确定了货币产生的上限，只知道“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是不能断定货币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要知道货币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最便捷的办法还是先找到最初的货币本身。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是铜币，包括刀币、布币等，于是人们便推想在使用铜铸币之前，我们的祖先可能以铜块作货币。在使用铜块之前，或者在使用铜块的同时，我们的祖先还使用过别的东西作货币吗？人们逐渐地把目光移向了贝。

人们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首先是因为有记载可寻。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提到夏朝曾使用“龟贝”作货币。另一西汉人桓宽则记道：“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后世或金钱刀布。”《盐铁论·错币》文学家扬雄也讲：“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晋朝人郭璞则说得更为形象：“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彩，贾以大小。”他认为“先民”使用贝

币，是根据贝的“文彩”来决定币值的，这种见解颇新奇，但不知是否有根据。人们还注意到，中国字中凡与钱财有关的，往往包含“贝”，如财、货、贮、赏、赐、债、贸、贪、贫（买、卖、宝的繁体字中也包含“贝”）等，这说明在汉字最初形成时，人们在观念上已把“贝”与钱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人们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也是因为考古资料作证。在河南仰韶村、山西芮城等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人们已经发现了贝。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被认为是夏代或稍早于夏代的历史遗存，在这一遗址内发现了天然贝和用骨头、石头仿制的贝。在对河南陕县七里铺、郑州上街等夏代历史遗存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仿贝。在商代历史遗址里发现的贝的数量最多，如郑州白家庄的一个商代早期墓葬中，发掘出460多个海贝。在河南安阳被推测是殷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中竟发掘出7000枚海贝。这说明贝很早就被使用，而且较早地被相当广泛地使用。当然，人们最初可能用贝作装饰品，后来逐渐地用为交换的媒介——“钱币”。

再次，中国的云南地区，在清末以前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一直使用贝作货币，这不但见诸记载，而且为老一辈人所亲见。我们固然不能武断地讲这一地区使用贝币与我们的祖先一定有联系，但这一事实毕竟说明古人以贝为币具有很大可能性。

最后，人们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还因为这样推断较合情理。前面说到，在夏朝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进行简单的交换和贸易，已经建立了专门用于交换和贸易的“市”。考古发现也表明，夏代各地的物资交流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例如在前面提到的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中，人们发掘出绿松石串珠、各种玉饰。安阳殷墟周围的商代墓葬中，也发掘出龟甲、鲸鱼骨、玉饰等。

这些物品分别产于我国的西部、东部边远地区，它们中应有相当部分因交换和贸易获得。又从考古发掘中人们了解到，夏代我国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手工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这势必要促使交换和贸易进一步发展。

从考古发掘看，贝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装饰品，还可能用来辟邪，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它又可分单个可合联成串，若在交换和贸易中作为媒介，有便于携带、便于计价、坚固耐久等优点。

所以，推想贝是最早的货币是较合情理的。况且，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古代也曾用贝为货币。

这里应当说明，讲到“贝”，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蚌壳，而我们祖先用为货币的贝，却不是一般讲的蚌壳，而通常是一种被称为齿贝的贝，它有美丽的花纹、闪亮的光泽，形象十分诱人，不然怎么能把它们挂在脖子上当装饰品呢！

古人以贝为币，是否就只以单个贝为计量单位呢？不是的。贝被使用虽很早，但就现有考古成果看，使用得最普遍、最多的还是商代和周代前期。我们所确知的中国最早的古文字也是通行于这一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商周时代青铜器主要是祭器上的铭文，金文和占卜用的甲骨上的文字中讲到贝的地方颇多，其中记述君主对下属的赏赐物时，讲贝的情况尤其多。

金文、甲骨文文献中讲到贝，大抵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讲若干贝，另一种则讲贝若干“朋”。属于西周前期文物的青铜器“遽

伯哀彝”上的铭文记述遽伯哀“用贝十朋又三四朋”。这一段文字不但表明贝在当时已成为货币，而且表明朋是贝的计量单位。

除金文、甲骨文之外，我国先秦文献中也有关于“朋”的记载。如《诗经·菁菁者莪》中就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诗句。那么朋是怎样的单位？一朋折合多少贝呢？

关于一朋是多少贝，汉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一朋是二枚贝，另一种说一朋是五枚贝。后人对这两种说法都颇有怀疑，因为金文的朋字主要有如下几种写法，从字形上可以推断：一、一朋所包含的贝数应当是双数的，所以讲一朋是五贝不妥。二、一朋似包含两串贝，每串的数目应不止一个，所以讲一朋是二贝也不妥。

清代国学大家王国维根据对古代文物和古文献的研究，提出了每朋为十贝的新见解。这一见解后来为考古发现所证明，郭沫若先生为此曾赋诗道：“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有人还从青铜器铭文中推算出每朋为十枚贝，看来每朋十贝的认识是接近实际的。

自从“朋”字被引申或借用为“朋友”的“朋”以后，“朋”的本意就被人们淡忘了，今天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朋”竟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单位呢！

最早的铜币

我们的祖先最早使用的“钱”是贝，那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又是怎样的呢？

对此《史记·平准书》有如下一段记述：“虞夏之币，金为三

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管子·山权数》则记夏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商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竹书纪年》也记商汤在位的第二十一年上，曾“铸金币”。

另外《逸周书·克殷解》《六韬》《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好几部历史典籍上都记述，周武王灭商进入商朝都城时，曾“振（一作‘散’）鹿台之钱（一作‘金钱’）”。这些典籍的作者有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有的是西汉时期人，他们都讲夏商时期我国就有了金属铸币。这可信吗？人们对《史记》的记述多有怀疑，讲夏代就又有金又有银，又有钱又有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对夏、商时期是否有金属铸币这个问题，人们也不敢轻易作否定的回答，于是人们只好又去求助于考古发现。

我国古代先秦时期一些典籍有灾年铸币的说法，如《国语·周语》记周大夫单旗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指铸币），权轻重，以振救民。”而《管子·山权数》记，夏禹在位时一连五年水灾，夏禹便组织人们“以历山之金铸币”，用以帮助因为没有粮食被迫卖掉子女的人赎回子女。商汤在位时一连七年旱灾，“汤以庄山之金铸币”，也用于帮助因为没有粮食被迫卖孩子的人赎回孩子。

《竹书纪年》载：“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周礼·司市》上也讲：“国凶荒札（札，指瘟疫流行）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按指布币）。”《盐铁论·力耕》也有类似的记述。看来至少在先秦以至汉代，灾年铸币的说法是流行很广的，很可能历史

上确有此种事。

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在灾年大铸钱币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似乎如下的回答较为更合情理：灾年铸币是为了用这些钱币到境外换取粮食，换言之，这样做可以用手工业的成果弥补农业生产的欠缺。

中国从夏朝就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近年出土了不少夏代的青铜器，相当精美。到了商代，我国的青铜器更进入鼎盛期，著名的司母戊方鼎，重675公斤，雄伟壮观，达到颇高的工艺水平。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不但有礼器、饮食具、武器，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具，如斧、锯、铲等。



后母戊大方鼎

有人推想，夏商之间人们可能曾以铜块为货币，但这种推测还未能被考古发掘所证明。从现在的考古发掘看，周代确实有以铜块

作货币的情况，然而类似的情况在夏商考古中却没有发现。

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在发现大批古代用作货币的贝的同时，也时常发现有些人工仿制的假贝与海贝在一起，其中有陶制的、骨制的、石制的、玉制的等，今人称它们为陶贝、骨贝、石贝、玉贝等。海贝既然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这些仿制的贝也应当是作货币使用的。既然可以用陶土、骨、石、玉制贝，则为什么不可以用铜制贝呢？事实上，确实有铜制的“贝”。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三枚铜贝。1971年，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殷代墓葬中又发现了铜贝109枚。近年发行的“钱币珍品系列纪念章”第一套第一枚就是专门纪念此事的。但商代距今那样久远，能保留下来的文物是很有限的，迄今发现商代铜贝的暂时只有这两处，要证实商代确曾以铜贝作过货币，似还感欠缺。

考古发现的周代铜贝数量较多，山西侯马上马周代墓群先后发掘出铜贝达2100余枚，有些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易贝卅寻”。据记述，其中“寻”据考证是秤量金属的重量单位，可见所讲的贝是指铜贝。据专家对一名为“留鼎”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考释，上面讲的是用100寻铜贝买下5名奴隶，这说明铜贝已被当作价值尺度。由使用自然贝到使用铜贝，这在情理上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人们在周代铜礼器时常常看到一个带“贝”字旁的字，有人释它为“债”，有人释它为“赋”，有人则释它为“货”，并且说这个字当时就是专门代指铜贝的。无论怎样，周代看来有些地方是曾以铜贝为货币的。那么，这些地方的这种作法是否是沿用殷商的旧

办法呢？

人们通常将货币称为“钱币”，或径称之为“钱”，那“钱”的本意即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经考察人们发现，钱的本意竟是一种农具。《诗经》上说：“命我众人，寺乃钱、铸（我命令我手下的农奴们，准备好你们的钱和铸）。”就提到了钱这种农具。农具和货币如何能联到一起呢？于是人们便想到布币，布币的形状如同一把铲子，早期的布币甚至还有能安装木柄的地方（所谓空首）。但是记载中，却不见直接称布币为钱的。

有人便解释说：钱与铺原本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都是指中耕用的铲子，而铺、布古代同音互用，而“钱”最初写作“泉”，古字形与铲子即布币近似，所以布币就是钱币。这样解释不太令人满意，但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目前还没有更让人信服的说法。如果我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布币应当是一种使用较早的货币，然而现存的和考古发掘中见到的布币，大多数却是战国时期的文物，少量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文物，那有没有更早的布币呢？

1953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一枚阔约10厘米、长约20厘米的青铜铲。1976年在陕西临潼县一西周遗址处，人们又发现了一枚与它大小接近的青铜铲。这些发现使人联系到1964年在晋南地区发现的一件周代文物。它形状像铜铲，但只有13厘米长，比上述二枚青铜铲要小。

于是人们进而联想到一个名为“作册卣”的青铜器铭文中“贝”“布”并提的情况，又联想到《古泉汇》上记载的长16厘米的布币等情况。于是有人提出大胆的推断：这些青铜铲比实用的青

铜铲小，比后来的铲状布币又大，它们就是最早的布币，即“原始布”，是由实用农具向货币过渡的中间形态。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则我国早在商代后期和西周，就已经有另一种最初形态的金属铸币——原始布在流行。

钱币的发展

西周时期

“太公九府圜法”和鱼形币 对于姜太公，人们并不陌生，但多是从《封神演义》上看来的，于是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等说法。姜太公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自古已然。相传姜太公姓姜、吕氏，名尚，一说名牙，因周文王曾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大诗人屈原的著名诗篇《离骚》中写道：“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而另外在他的《天问》中却又提出疑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姜太公在店铺里，周文王怎么会认识？姜太公敲击刀子大声吆喝，怎么就获得了周文王的赞赏？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姜太公发迹前曾在商店里作过事。

关于这一点，先秦两汉不少典籍中都有记载。例如《战国策·秦策》中说姜太公曾是“朝歌商朝都城之废屠”。《尉繚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淮南子·泛论训》说：“太公之鼓刀……出于屠酤之肆。”此外《韩诗外传》《说苑》《列女传》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可见此种说法流行之